

# 东西方文化评论

(第一辑)

深圳大学

(建校五周年专刊)

# 东西方文化评论

(第一辑)

---

《东西方文化评论》编委会  
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

一九八八·四

## 开 卷 语

今年，是深圳大学建校的第五个年头。就大学作为现代文明的基础形态的发展史来看，它当然过于年青了。

大学作为人类自我培养的基本形式，诞生于十一—十二世纪，它从基督教旧的主教座堂学校转变形成，并随之接受了近代人文精神的洗礼。简言之，大学形态是在西方基督教传统文化和近代人文科学的双重精神支配下发展起来的。这就规定了大学形态的双重职能：人的人文教育和实科教育。在中国，大学的形成仅有近百年的历史，相比之下，深圳大学尚是一株幼苗。

然而，深圳大学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诞生的。它的生命与改革开放的命运息息相关，并因此而更具有改革开放的勇气。

我校的建设，已在实科教育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然而，从西方先进大学的成功经验来看，实科教育与人文精神素质的培养紧密相关。在校长的关怀下，我校中青年学者一直在为加强我校的人文素质而努力。两年前，我们出版了《青年学者论学集》，并得到国内学界专家的好评。值此建校五周年之际，我们正式推出此集刊。它立足于新时期文化精神的建设，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为我校的建设进一步作出努力。

集刊由校长基金赞助出版，并得到我校行政学系、中文系、经济管理系领导的支持，谨此致谢。

《东西方文化评论》编委会

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

一九八七年四月

# 目 录

|                      |                     |
|----------------------|---------------------|
| 熊十力与中国现代哲学.....      | 景海峰 ( 1 )           |
| 谭嗣同哲学思维的反思.....      | 黄卫平 ( 31 )          |
| 文化哲学的兴起和价值哲学.....    | 林英男 ( 63 )          |
| 原始的游踪.....           | 章必功 ( 73 )          |
| 考古发现与文明史认识的新进展.....  | 刘御风 ( 91 )          |
| 福科的考古及其启示.....       | 钱 俊 (106 )          |
| 从结构主义到分解主义.....      | 杨 朗 (143 )          |
|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传统寻踪.....    | 全斗辉 (158 )          |
| 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的范式变换..... | 方宏进 (167 )          |
| 论影响管理效能的心理原则.....    | 萧 荣 (202 )          |
| 论语言能力的形成与发展.....     | 吕 勇 (218 )          |
| 比喻的时空谈.....          | 刘英凯 (232 )          |
| 为什么研究权力：主体的问题.....   | 〔法〕福 科 (248 )       |
| 诺瓦利斯关于死亡的革命宗教.....   | 〔美〕维塞尔 (258 )       |
| 《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导言.....  |                     |
| .....                | 〔联邦德国〕H·R·耀斯 (286 ) |
| 语言与沉默.....           | 〔美〕哈里斯 (301 )       |

# 熊十力与中国现代哲学

景海峰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熊十力（1885—1968）无疑是最富有思辨性和形而上气味的原创型哲学家，他的“新唯识论”体系在纷繁复杂但又贫弱交加的现代哲坛独树一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哲思印迹。其深沉的困境意识和如泣如诉的情感投注体现了一个有真情实感的哲人对真理的痛苦追寻，其动心忍性的甘于泊寞和大雄无畏的“掉背孤行”又表现出一个深刻的思想者不追俗沉浮的自主自立；他的“规模宏阔、神解卓特”、平章华梵、融贯东西的哲学创制是时代精神的凝聚，他的汲汲遑遑、饱浸忧患而自赏自怜的本体建构又是时代痛苦的映照。

按年龄来讲，熊十力应属五四的一辈；论个人气质，其卓尔不羁、从不规行矩步“为他人作概论或历史”的博大才情，也足以能使他成为独步那一时代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但由于坎坷而独特的经历，致使他向学甚晚，迟落为后五四时代的一员。尽管早在1922年，他就受聘到北大任教，赶上了新文化运动的尾声，并有一定的论学参与；但作为一个现代哲学家，他的生命光彩的显露，他的学术地位的奠定，无疑是在三、四十年代。这样，在同一时期具有思想原创的哲人群体中，<sup>①</sup>熊十力便成为他们当中最为年长而颇受尊敬的一位。

熊十力一生著述三百余万言，有二十多本专著，从始作（1918年的《心书》）到封笔（1963年的《存斋随笔》），前后

---

<sup>①</sup>这里的哲人群体是指三、四十年代自创体系并有所建树的一批哲学家，除熊十力外，还有金岳霖（1895—1984），冯友兰（1895—），贺麟（1902—）等。



达四、五十年。在近半个世纪的哲学生涯中，人文精神的探求和本体论的建构始终是他的学术关切所在，其著书立说、穷索显揭，无一不以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为辐辏，这在混乱浮浅、杂无町畦的现代哲圃中，显得格外精当纯正。因此，他被称为“是五四以后最有成就的职业哲学家之一”（冯契语）。透过熊十力气魄宏大、直泄心怀的笔触和满纸的恳切语、策勉语、提记语、警戒语，我们不难把握他的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其行思运作的心路历程，理论框架的逻辑结构，以及汲汲以求的价值取向和学问关注，也是明白如许的。困难的是如何在这强烈的政治意愿弥漫和普遍的政治因子楔入的现代思想界，给这位远离政治，“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的哲学家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

### 一、传统与反传统

1902年，年仅十七岁的熊十力“即与王汉、何自新诸先烈图革命，旋入武昌兵营当一小卒”，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反清革命，奔走呼号，联合有志之士，发起成立黄冈军学界讲习社，参加日知会，亲历了辛亥风云。武昌首义成功，熊十力欢欣鼓舞，意气激昂。这年冬天，他与吴昆、刘子通、李四光等黄冈四友同聚武昌楚雄楼，共出一纸，各言所志，写下了“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八个字，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气概和昂扬的革命激情。<sup>①</sup>但时过不久，袁世凯大权在握，排挤革命党人，在武昌大肆捕杀辛亥志士，熊十力亦亡命江西德安。“忽起念云，哀哉！人生乃如是耶？怆然欲泣”，一下从希望的高峰跌入失望的深渊。护法运动失败后，熊十力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彻底绝望，“念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自始“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他正是以“茫茫前路无归处，暮风秋雨江

---

<sup>①</sup>参阅燕大明《熊十力大师传》，载《中报》月刊（香港），1980年11月号。

上舟”的失落和迷惘脱离政界而转向理论上的苦苦探寻。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封建余孽攫取，洪宪改元，张勋复辟，几幕丑剧，山河依旧，“贪吏展牙于都邑，盗贼接踵于国中，法令从心，冤狱山积，交通梗塞，水旱仍天”，①“自三五以降，吾国之不道而至于无是非，未有如今日”。②熊十力“忧世之思深，愤世之情急”，陷入了巨大的苦闷和徬徨，遂远离现实，苟求于学术一途。这年凄凄惨惨、苦寻无路、逃避难局，是辛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时代的绝症。中国自闭关自守、抱残守缺而沉溺于天国的梦幻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后，经历了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转折过程。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坚船利炮的企望也在甲午一役冰消瓦解、化作轻烟；随之而来的百日维新试图效法西洋，革除弊政，对老大帝国的岌岌可危有所扶助，不期很快就被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所扑灭；以种族革命为帜，有摧廓之功的辛亥首义推翻了满清王朝，却又因为未慎绪始，乃致鲜克厥终，导致了封建复辟和军阀割据。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和被动适应，尽管也带来了一些变化，但笼罩在全国上下的被列强瓜分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共和政体仍然无救于古老中国的蹇运，她所面临的是更为艰难的选择。同时，徬徨无计的近代知识分子被进一步推向心态破裂的边缘，这就是从根本上抛弃传统文化、与“至圣先师”彻底绝决时刻的来临。

熊十力步入学界，迎面而来的便是这全面反传统的“当头棒喝”。

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出现是必然的。近代中国左右不逢源的长久困局和横也不是、竖也不是的难堪境遇，使相当一

---

①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

②熊十力：《心书》，1918年自印本，第15页。（下引熊著，不再注作者名）

部分知识分子逐渐萌发了一种自卑自弃的心理，总觉得自己万事不如人，一出娘胎就错了。这种自怨自哀的群体意识导致了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和对全盘西化的深切想往。如傅斯年在一篇答读者的信中说：对西方“极端的崇拜，却未尝不可。……因为中国文化后一步，所以一百件事，就有九十九件比较的不如人，于是乎中西的问题，常常变成是非的问题了”。<sup>①</sup>新的就是好的，西方的就是先进的，几乎成为全盘西化论者天经地义、不容置辩的观念。这种不加任何理性分析的极端主张，一方面是在巨大的创痛所造成的麻木之后所萌生的一夜之间脱胎换骨的天真愿望，另一方面又是一种极度虚弱的自卑心理的深层反照。

从文化史上看，五四时期这种极端的反传统思想，不但在中国是史无前例，就世界范围来讲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年的演变发展，其本身的格局所附丽的种种弱点已全部显露出来，颇有捉襟见肘、穷途末路之感。到了近代，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气势夹裹下，更是衰象毕露，难以喘息。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千迴百折的重重苦难和刀逼喉头的沉沉危机，必然促发一种过分期期待的心理，总想着急于找到一条一举摆脱苦难、走出危机的出路。这种心理期待往往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浓重的赌注意识，普遍的寻求和尝试约简化为专一的厚望和押寄，只要认准了一个，便不顾一切，趋向极端，随之而来的失败在破灭的废墟上更加剧了下一个期待情感色彩的强度。洋务运动是一个期待，变法维新是一个期待，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是又一个期待。同样，脱胎换骨、全盘西化的意愿也是这种过分期期待心理的必然导出。激情容易产生极端，急切难免出现偏执，这也许是能够用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主义来验证的一个心理通则。

林毓生在分析中国近代意识的危机时，引入了希尔斯（E·

---

<sup>①</sup>《通信》，《新潮》第一卷，第三期，1919年3月1日。



shils)的“奇理斯玛”(charisma)理论,指出“在中国,‘奇理斯玛’的中心所在是王权,所以清朝覆亡以后,在中国社会中的‘奇理斯玛’便破裂了”。<sup>①</sup>儒家入世精神的人文理想和现实关切是通过出仕的途径来实现的,科举考试的纽带将知识分子和王权政治紧紧地拴缚在一起,传统文化必然依附于王权政治,普遍王权成为中国文化一切价值层面的纲维。1905年科举考试的废除,1911年帝制的被推翻,使传统文化成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落叶飘萍。传统文化与王权政治的深深融合所形成的不可分割的连带关系和鲜明的一体化,使传统文化在普遍王权崩溃后,不可避免地招致覆灭性的打击。这种一体化同时也造成了无限张力的极端两极,一极是全盘西化论者对传统的彻底弃绝,另一极则是封建余孽和反动军阀对传统的顽固维护,南辕北辙,势如水火。而半个多世纪处处被动挨打的惊痛和传统不济世用的一次次验证,使怀抱救亡图存愿望的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渐起一种失望感和厌离感,很容易激发普遍怀疑和彻底批判的精神;反传统便成为顺应那个时代发展趋势的主流。相反,一些徒知抱残守缺,徒知“六艺之传必无可废之理”却不知其所以然的反对者(如林纾等人),只能缄口敛手,采用影射加谩骂的方法一泄胸中的愤懑。<sup>②</sup>

危机的痛感——血性的激情——极端的张力,到五四运动达到了高潮。五四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剧烈变化和迅猛发展,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逐渐转入冷静的思考和踏实的着手,这就是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全面而较为客观深入的比较和从纯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层面反省向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社会

---

①《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28页。

②当时林纾在上海《申报》上连续发表了《荆生》、《妖梦》等小说,采用影射的手法诋毁新文化运动,其低劣下流,以至于被时论讥为“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的行径”。

革命运动的过渡。同时，全盘西化的理想主义和反传统的浪漫色彩也逐渐暗淡下来。极端的张力开始松弛，由水火不相容的两极对峙演变为多元化取向的价值探求。

熊十力二十年代初到北大，尽管与鼓吹东方文化的梁漱溟过从甚密，但并没有立即卷入东西文化之争的漩涡。当时他完全沉浸在对佛教唯识学的哲学思考中，而浮泛不实的东西文化竞长论短似乎没有引起他的多大兴趣。在其早期著作中，既没有对传统文化危机的救挽意愿，也看不到对激烈反传统主义的任何回应。直到三十年代中期，对传统的全面检视和对反传统的深刻反省才开始成为他以后长久关注的理论课题。所以从时间上讲，熊十力的东西方文化观不属于五四的激情时代，同刘师培、林纾、辜鸿铭等人的“国粹”立场有根本的区别；同样也不属于科玄论战的文化分离时代，同梁漱溟、张君勱、梁启超等人的东方文化派观点也有很大不同。

毫无疑问，熊十力哲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的，他本人也是以传统文化维护者的面貌出现于现代思想界的。近代中国文化百疮百孔的颓势和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主义所引起的震惊，长久萦绕在他的心头，难以排解。如何“调整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去粗取精，批判地继承，“以应新时代”的需要，是他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探玄论学的重大关注。熊十力认为，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年封建专制的毒害和历代“奴儒”苟且利禄之心的腐蚀，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生命体验和超越意识；特别是经过近代西潮的冲击和激烈反传统主义的无情打击，更是气息奄奄，垂垂待毙。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自尊自信也差不多丧失殆尽。面对这种衰局，如何树立民族自信心和重建中国本位的文化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他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一方言大同，一方又谋复辟”的挽歌情调，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东涂西抹，浮

浅混乱”的无本无根亦深感不安。<sup>①</sup>他认为新的中国文化只能以经过批判改造后的传统中国文化为根底，然后融合西方文化，创建植基深厚而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对传统文化，他反对全盘弃绝，认为中国社会经两千年停滞不进，如“久病之夫”，只有“掘发其固有宝藏，涵养其自尊自信之毅力”，如良医“谨其攻伐而善护其元气”，才能“消其郁滞，则痼疾自除，而生命力乃日益充沛”。“若遇医师缺经验者，将横施攻泄，大伤根底，病夫立毙，可哀孰甚”。<sup>②</sup>所以他对“清末以来，国人恒自卑，视固有学术都不成为学术”，“五四运动以后，菲薄固有，完全西化之倾向，窃有所未安焉。”<sup>③</sup>他认为，东西文化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应“观其会通，而不容偏废”。所以对“中学精意随其末流之弊以俱被摧残，如蒜精之美不幸随其臭气而为人唾弃，因是惶惧”。<sup>④</sup>

熊十力对传统文化所抱的“好自护持，毋令断绝”的心情，并非完全出自文化守成的意愿和欣赏历史传统的怀旧，更不是仅仅基于对激烈反传统主义极端主张的意气之愤，而是出于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因理论根基薄弱而不能挺立自主，最后归于失败的切肤之痛，以及对残败不堪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适应世界思潮、完成现代转型的深深忧虑。他认为“清季革命思潮从外方输入，自己没有根芽。当时革命党人，其潜意识还是从君主制度下所养成之一套思想，与其外面所吸收之新理论，犹不相应”。<sup>⑤</sup>所以造成浮浅混乱，“士习学风江河日下”，封建专制主义的幽灵长久徘徊不去，西方科学民主真正有价值的新知扎根不下的困局。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智而深刻的反省，肃清封建专制主义

①《原儒》，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6年12月版，上卷，第51页。

②《十力语要初续》，香港东升印务局，1949年12月版，第14页。

④《十力语要》，1948年湖北印本，卷三，第2页。

④《十力语要》，卷一，第51页。 ⑤《原儒》上卷，第49页。

的遗毒，吸收顺乎世界潮流的西方新知，为“同情天下劳苦小民，独持天下为公之大道，荡平阶级，实行民主，以臻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sup>①</sup>的资产阶级民主理想奠定自本自根而宏阔坚实的理论基础，是熊十力寄望于传统的真实意义所在，也代表了他探寻古老的中国文化未来出路的独特追求。

## 二、文化保守主义

五四时代对儒学摧枯拉朽般的打击，使传统文化的声誉和知识分子赖以建立的自尊自信一落千丈。当时先进的中国学人无不一不站在反孔的行列，“决心要对于圣人圣经干裂冠毁冕、撕袍子、剥裤子的勾当。”<sup>②</sup>而维护传统几乎成为“反动”、“落后”、“顽固”、“冬烘”的代名词。充满激情的理性批判精神，对传统的普遍怀疑和彻底决绝，成为那个时代不可抗拒的历史意愿和潮流。五四的时代批判精神和科学民主的高扬对古老中国所起的震古铄金、振聋发聩的作用是空前巨大的，它的启蒙意义具有永久的历史价值。但从文化层面省视，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全盘西化主张和对传统文化的约简化处理显然是失当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后五四时代相当一批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估和对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回击，熊十力便是他们当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位。

张申府写于二十年代末的《所思》中有这么一段话：“‘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是害死了中国的话。中国人而说这种话，当然‘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但是什么是‘天理’？）中国人从此一定不再说这种通身奴气为虎作伥的话。”<sup>③</sup>但张氏的警句并不能使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辈们怯步，差不多与此同时，胡

---

①《原儒》上卷，第52页。 ②钱玄同：《致胡适》。

③《所思》，三联书店，1986年12月版，第66页。



适在写给吴稚晖的一封信里说：“先生对东方民族的悲观，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发‘中国不亡，世无天理’的感慨。看看咱们这个民族，实在只有低头叹气。”①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一文中更说道：“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这种极尽冷嘲热讽，近于自侮自辱的谩骂理所当然地激起了怀有强烈民族自尊感和对中国文化衔泪泣血般维护的熊十力的强烈不满，在他三十年代以后的著作中，每提及胡适，总是愤愤难平，毫不留情地加以痛斥。②

熊十力认为，近代中国的真正可悲不在于它的经济落后和物质贫乏，而在于本根良知的泊没和民族自尊的丧失。对西方的学习，需要一种自主自立的思想气度，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意愿和一种敢于正视人类存在深层意义的勇气，而这些正是近代知识分子所缺乏的。在西潮的冲击下，抛却自我，失所归依，丧失自信，随波沉浮，正是造成近百年思想界贫乏、浮浅、混乱、杂芜和社会“无生人之气”的根本原因。他批判当时对西学奴化心态的崇拜和支离破碎的了解，认为这只能造成旋生旋灭的时流风尚和只及皮毛的虚夸竞浮，而对真正理解西方文化，吸收西学精华毫无益处。对西学不加分析地盲从，只能象《吕氏春秋》上所说

---

①《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469—470页。

②熊、胡两位私嫌甚深，已为学界共知。除了激进与保守，主张西化与维护传统的根本立场不同外，胡年少气盛，受正规学院教育，有留洋资历，而熊步入学界甚晚，一无文凭，二无资历，全赖自学成才；胡重实验主义方法，喜考据，而熊好玄思，最厌恶考据；胡好名心重，结交权贵，喜赶浪头，而熊甘耐寂寞，纯为一书斋中人。这些差异使他们常生扞格，虽为多年同事，且又同行，但两人几乎没有什么来往，却不乏文字上的相互攻诋。就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言，熊当时根本不足以与胡对垒。但二人交恶，影响至远，他们的弟子和拥护者亦势如水火，常起争端，这种情景在如今的港台学术界还能依稀可见。



的“海上逐臭之夫”，不但徒劳无益，而且连自己固有的识见都糟踏掉了。熊十力强调，对自己民族的自信和对传统文化的自尊是迎接世界潮流、吸纳西方学术的首要前提。正如庄子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如果自贱自戕，丧失重振的信心和迎头赶上的勇气，只是一味哀声叹气，低眉顺眼地扑伏于西学的脚下，那么中国文化就永无齐列世界文化之林的时日。

熊十力对东西方文化的衡估和对全盘西化论的批判，完全是立足本位的。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和重智主义倾向弥漫在对传统的美好型塑和对未来中国文化前途充满自信的遐想中。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立足本位文化融合中西，以应新时代要求的意愿，我们借用史华慈(B. Schwartz)提出的“文化保守主义”这一概念，<sup>①</sup>来分析熊十力的文化心态。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有密切关系，但又有很大不同。从根本上来说，文化保守主义者并不是墨守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现状的政治保守主义。在政治观点和社会立场上，他们可以采取很激烈的态度和方式，而对待文化传统却恭敬备至，充满刻骨铭心的爱意。这种情形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界可以说不乏其人，如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章太炎和作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就恰能表现出这种极端矛盾但又圆融无碍的和谐统一。

本世纪初的英国政论家塞西尔(H. Cecil)在其有名的《保守主义》一书中写道：“保守主义在政治实践上当然是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的。然而，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体系而论，它并不同这二者直接对立。”<sup>②</sup>就文化层面言，维护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不但不反对社会革命运动，而且有可能成为它的同情者和支

---

<sup>①</sup>参阅史华慈所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堪布里奇，麻省诸塞，1964年）及《论保守主义》一文（载傅乐诗(C. Furth)所编《变革的限制——论民国时代的保守主义》一书中）。

<sup>②</sup>《保守主义》，杜汝楫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5月版，第155页。

持者。熊十力对于现代中国革命的态度，便是如此。在政治上，熊十力是一位坚定的爱国民主人士，对封建专制主义深恶痛绝，对民主革命有深切的向往和极大的关怀。比起自由主义的胡适，他可能更容易接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理想。事实上，他也确实是中国共产党人相当要好的朋友。<sup>①</sup>

中国现代思想界的文化保守主义与西方近代的保守主义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这就是由英国思想家柏克在《法国革命随感录》（1790年）一书中开其端绪的西方保守主义主要是针对激烈的政治革命和由此引起的巨大社会变革而发的，这种守旧和复辟的思潮偏重于政治、经济及宗教领域。而中国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却纯粹是民族文化危机的产物。在西方思潮“其势滔滔，殆不可遏”（李大钊语）的猛烈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被从根本上铲除的灭顶之灾，对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和统绪意识强烈的文化系统来说，其本身必然产生巨大的反馈作用，以回应这种外部的惊激，文化保守主义便是这种反馈的表现方式之一。

文化保守主义常常表现为对传统的自尊和维护。这种倾向随着西学东渐和传统文化的失势日见其长，传统文化越是面临困境，它表现得就越是强烈。而自尊感和维护感往往又和民族主义的情绪交织在一起，正如史华慈所说：“保守主义的另一特性即其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sup>②</sup>三十年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十分嚣张之时，民族空前的危机更加重了这种自尊感和维护感的悲壮气氛。熊十力当时避难入蜀，居野寺，伴孤烛，还为随行诸生开讲中国历史，大谈五族同源，即是这种情感最真切感人的表露。当时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十分兴盛，取得了

---

①有关这方面的材料现已发现很多，笔者无意一一赘述。请参阅齐勇的《熊十力先生散记》之最末一节，见《人物》双月刊，1986年第6期。

②《论保守主义》，见《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80年6月版，第25页。

不少重要成果，并且有一批立足传统文化、建构哲学体系的思想家出现，也是这种机缘的最好见证。

文化保守主义除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外，还带有明显的唯智主义色彩。他们特别强调精神力量的决定作用，认为思想和文化的改革应优先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林毓生将这种倾向称之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sup>①</sup>熊十力弃政从学，即因“深觉吾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痛士习民风之敝，以为革政不如革心”，而民初以来，更是“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所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sup>②</sup>从思想文化入手，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无论是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看法，还是对东西文化学术上的衡定，唯智主义是熊十力一以贯之的原则立场。他所专心致志的就是要建立一种以改变了的世界观为根底的文化基础，以此实现一个现代儒者经世致用、匡济天下的人文理想，这种努力从心理深层凸显出熊十力强烈的文化救国意愿和对中国文化前途的无限希冀。

追溯熊十力的文化保守主义，我们可以发现潜伏在五四时代反传统主流背后的另一种趋势，这就是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破产论和东方文明拯救论的萌发与兴起。<sup>③</sup>这股趋势所表现出的文化心态和保守主义价值观，同清末一般士大夫愚昧麻木、荒唐可笑的种种情状已有根本的差异，同民初国粹派因袭夷夏之辩而不愿放弃对传统的心理优越和自欺自足的顽固守旧、逆反新潮的种种言行也有很大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股趋势不仅是

---

①参阅其《中国意识的危机》，第43页。

②《尊闻录》，1930年自印本，手札，第20页。

③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思想文化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巴黎和会成为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从而助长了反传统主义的声势；另一方面，大战给欧洲带来的灾难，又唤醒了国人极端崇拜西方文明的迷梦，传统文化的声誉似乎有了挽回之机。

西方文化直接挑激的结果，而且是西方思潮间接移植的嫁品。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在西方危机意识的影响下所出现的对西方文化的重新认识和评估，以及对东西方文化关系新的调试意向。

梁启超游历战后欧洲各国所作的《欧游心影录》（1920年）无疑已经流露出这种在世界主义的旗号下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愿。他同柏格森之师布特鲁（Boutroux, 1845—1921）等人的谈话，借西方人之口盛赞东方文明，虽从一个侧面映照出中国知识分子孤苦无望而又不甘绝望，寻找解脱、自安自慰的心迹，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东西方文化对话气氛有所改变的实际情况。张君勱的《人生观》（1923年）更是西方危机意识背景下的产物。张氏在德国时，即从学于对西方文化持悲观主义态度的哲学家倭铿（R. Eucken, 1846—1926），回国不久，又担任德里希（H. Driesch, 1867—1941）的翻译。德里希也是一位极推崇东方文化的德国哲学家，他于1922年10月来华，在近一年的访问讲学中，竭力宣扬西方文明破产论和东方文明拯救论，这些理所当然地成为张君勱维护传统文化的直接武器。二十年代初，印度诗人泰戈尔（Tagore, 1861—1941）展示西方危机、礼赞东方文明的一系列活动和言论，无疑也对这股保守主义趋势起了很大的推促进作用。

尤可注意的是，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学衡》（1922年元旦创刊）诸友，大都出自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I. Babbitt, 1865—1933）的门下。白氏在哈佛执教近四十年，是本世纪初新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坚决反对卢梭的自然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强调道德理性的决定作用和人类文化的有机整体性，尤其对二十世纪的文学思